



▲夏夜,钟鼓岭
热闹夜市

▲上世纪
八十年代的钟
鼓岭农贸市场

钟鼓岭 往事并不如烟

欧阳光宇

钟鼓岭在株洲家喻户晓,其名源于明清时期,斯时此地尚是荒岭,岭北有座古寺,晨钟暮鼓响彻荒岭,故得其名。现在的钟鼓岭是个社区,株洲的社区不胜枚举,为何钟鼓岭的名气在众多社区中独占鳌头呢?

下过围棋的人知道,下围棋落子有“金角银边”之说,钟鼓岭地处株洲市中心的东南,既占金角又占银边,之所以这么有名,是因为钟鼓岭街区的商贸,汇成了株洲中心商圈的顶流。

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,株洲最先试水市场经济的地方,不是南大门,不是徐家桥,而是钟鼓岭。钟鼓岭开挂式的摊贩、集市、自由贸易,成为南大门、徐家桥等集市的“学长”。尤其是南大门,最开始深受钟鼓岭的影响,依样学样的摸索中,走出了服饰贸易市场的路子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我小堂哥刚成年不久,从农村只身来到株洲,借住在城北的姐姐、姐夫家。当时他上无片瓦,下无寸土,说株洲是个包容的城市,尤以钟鼓岭为最。小堂哥为了在株洲立足,每天从城市北端的株冶,骑单车到市中心钟鼓岭,随季节批发水果等食品,然后再用单车载着这些货物,骑到城北的湘天桥贩卖——夏天卖西瓜,冬天将红薯自己烤制了,卖烤红薯,又将各类肉制品加工卤制,卖卤味,总之啥好卖他就贩啥,钟鼓岭帮小堂哥度过了他最艰难的岁月。由此为起点,小堂哥一步一步在株洲成家立业。钟鼓岭包容了许多像我小堂哥这样年轻的农民,为他们提供做生意的平台,让他们从0到1逐步积累,直至完全融入株洲这座城市。

我认识钟鼓岭,至少比我小堂哥要早十年,那时我七八岁的样子。从钟鼓岭街的北口往南走,一直走出去,面前便是车站路,车站路东便是株洲火车站,往西临江的是当时的株洲市一医院,我妈在市一医院工作,所以我经常带我穿过钟鼓岭这条街。儿时印象中的钟鼓岭,有村庄集市的乡土味道,官方语言称农贸市场,市民俗称就是菜市场。我在这里相续看过瞎子讨钱,哑巴卖刀。

瞎子是位微胖的妇女,旁边还带着两三个小孩,她伤心地哭着,这时过路的行人,全都变成了热心肠,踮脚地给她钱,她一边哭,一边把钱装进口袋。见此情景时,我还是位无非是非判断的小孩,单纯地看着,我妈也拿出一些钱给她,然后一边走一边跟我说:这样的人最是可怜,眼睛看不见,还带着小孩。听我妈这么一说,我立马明白,大家给她钱是对的。那时的人们都不藏奸,也不会怀疑这事是真是假。

约莫大了两岁后,我又在这儿看到过哑巴卖刀。只见那哑巴一副跟你急的样子,他说不出来话,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他的刀有多棒,便急着手用刀斩粗铁丝,他总那么个卖劲的样子,比大声吆喝还要感染人,我妈又被打动了,买了哑巴的刀。不过事后听我妈念叨说,那刀的质量不咋的。估计是哑巴用肢体语

言描述,夸大了刀的强度。钟鼓岭集市一开始虽然带着村庄的乡土气,但与乡村赶集那种还是有很大不同。其关联的路和周边环绕的资源得天独厚,东连人民路,南连车站路,西连建设南路,北连新华西路,在株洲河西未开发前,这四条路都是株洲主干道,钟鼓岭的交通格局远非乡村集市可比。

钟鼓岭隔着人民路可以与株洲火车站称兄道弟,其东端当时是株洲市委第二招待所,二招(第二招待所的简称,下同)的肉包,好得令钟鼓岭周边小孩梦里都流口水;二招的防空洞,常年四季可以吓唬小孩,孩子们一进防空洞就提心吊胆,经常吓得半死出来,比现在的密室逃脱刺激多了。再加上其北端东面是铁路一小,无形中便成了我们孩子的乐园,做细仔子的时候,最乐意到钟鼓岭来玩了。

与钟鼓岭西北端隔着十字路口相望的兄弟单位,大的就有好几家,湘江百货大楼(现株百)、市邮局、市委、市政府、市建委、市委第一招待所、市影印厂、市二轻局、日报社、市科协;南面隔马路是株洲市青年照相馆和影剧院;西端那儿是一个大的国营菜店,往北又是湘江饭店,这使钟鼓岭市场一出世就热闹非凡,四面的“靠山”很足,虽然始于草根市场,集结河西而坐轮渡(当时株洲一桥尚未修建)过来的农民挑担在此卖菜,但钟鼓岭的基础使其不限于土气,而是兼收并蓄地做成了闹市中的大市场。

上世纪80年代,钟鼓岭“挑灯夜战”,率先打造“夜经济”的名片。夜幕降临,钟鼓岭灯火通明,卖螺蛳、小龙虾、麻辣烫、臭豆腐等夜宵的摊位满街都是,热度飙升一直持续到今天,当年在钟鼓岭经营夜宵摊的,不仅有农民、工人,还有机关干部、退伍军人和高校毕业生,这条街上聚集着改革开放初期全民皆商的氛围。

钟鼓岭那些出入口,用“三头六臂”来比喻,似乎还不够,得用“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”才行。你不但可以从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出入钟鼓岭,还可以找到N多巷口出入。

本世纪头十年,钟鼓岭还有两件大事值得记录:一是2003年株洲书城整体搬迁至钟鼓岭,扩大了这条街的经营范围——原来,钟鼓岭卖农副产品,卖生鲜、熟食、小吃,也经营刻章子、补锅子、修伞、修鞋子等五花八门的行当,但一个书城的整体入驻,算是改写了钟鼓岭的一部分历史;在2009年,钟鼓岭作为株洲最老最大的农贸市场关闭搬迁,经营户被分流到湘江红和丰园农贸市场,钟鼓岭被定位为商业步行街,实现了整条街的升级换代。

钟鼓岭市场一出世就不缺人流量,热闹程度之高,从早年到如今不减分毫,这里是株洲烟火气最浓的地方,积攒了无数株洲人并不如烟的钟鼓岭往事。

遥远的记忆

谭光辉

小时候,成弦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首都北京。记忆里,成弦是离山最繁华的地方。那里交通便利:东边铁路的土火车直达成弦;漕泊、离山的竹木在成弦上船转运;漕泊、离山人出去闯世界,成弦是必经之地。那里有肉食站、粮站,有收购站、药店,有饭店、店铺和船厂,有大部队、医疗点,还有我们最希望跟着父母去去的“合作社”。

成弦“合作社”即当时红极一时的成弦“供销合作社”。“合作社”主体建筑为砖木两层楼,河边上的一长溜是一层平房,为“供销社”的仓库和生资门市部。仓库两边开门,一面临河,便于船只装卸货物;一面临街,与主体楼隔一条渠道,有便桥连接。记忆里,“合作社”什么都有,南杂百货布匹文具应有尽有。为了方便顾客,商品分类清楚,摆放整齐,墙上还挂着诸如“北京的确实”等巨幅广告画。

跟着去“合作社”,总会有收获:几颗硬糖,一本小人书,一小包盐……

我的第一本小人书《共产主义战士雷锋》就是跟父亲在“合作社”买的。有一年冬天,我跟母亲去“合作社”,意外碰到前来购物的大姐夫。那一次,姐夫给我买了几十颗硬糖。稍大一点,大人忙于出工挣工分,有些采购活如打煤油、买火柴、买白糖、买糖海带,就由我与小妹去完成。报酬是每人五分钱的硬糖。

“咚咚咚咚咚咚!”“咚咚咚咚咚咚!”……那是波浪鼓的声音。

波浪鼓是小货郎的标配。小货郎亦称“货郎子”。小货郎即旧时在农村或城市小街僻巷流动贩卖日用杂货的商贩。他们肩挑担走乡串户,悠悠

叫卖,有的兼收购土特产品。

小时候,波浪鼓是我们最想听到的声音,小货郎是我们最想见到的陌生人。

小货郎进村了,屋场里的老人小孩全围了上来。大家纷纷带着平时攒起来的鹿皮鸡毛鸡内金、废铜烂铁旧凉鞋等,来换几个针头线脑、火柴顶针、硬糖脆饼什么的。一阵讨价还价之后,老人小孩各自换到了自己心仪的东西,小货郎则挑着满满的货担忙着去琴瑟赶“划划”了。

现在想来,这些精明的小货郎肯定低价购到过古董宝贝。自从公社迁至陶坪,自从高虎坳通车、酒露公路通车,陶坪成了离山公社政治文化中心,曾经分布在南岸、上龙、成弦的几处“供销合作社”也逐步合并到陶坪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“代销店”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。十字路口、桥头码头、屋场中心……有井水处,皆有“代销店”。

三十几年过去了,昔日深受人们欢迎的小货郎、供销合作社、代销店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,取而代之的是“步步高”“沃尔玛”等大型超市,是“天猫”“京东”“唯品会”“拼多多”“苏宁易购”这些购物平台。

现在,虽然物品丰富、购物便捷,但我总觉得少了小时候那诗一般的味道。

好怀念木心笔下《从前慢》里的美好时光:

记得早先少年时,大家诚诚恳恳,说一句,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,长街短街无人,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,钥匙精美有样子,你锁了,人家就懂了。

母亲的眼泪

张淑兰

春节回到家,便开始发烧,买了抗原试剂一测,竟然又阳了。怕传染给父母,便独自窝在家里,开始昏昏欲睡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,等我一睁眼,母亲正守在床前。我吓坏了,母亲有基础病,要是给老人家传染上,那还得了。当时,我急了,赶紧用被子把头捂住,大声督促着让母亲走。可是母亲不走不说,还端来一碗汤让我喝。这下,我真的生气了,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大声呵斥说:“你不要给我添乱好不好,我一个人得病就够受的了,你再搭进来,病倒了,可咋办?”好久,母亲端着那碗汤没有说话,静静地转过身去,哭了。

人毕竟是脆弱的,尤其是上了年纪。我知道自己言重了,一时不知所措,因为母亲很少在我面前流泪,仅有的两次,也是在我生病的时候。生女儿那年,我剖腹产,因为麻药没打好,疼得在床上直打滚。母亲站在楼道里转圈,看见医生或者护士就把人家拉进来让我止痛。当她们说最终还得自己忍受时,母亲就哭了。她抱着我的头,让我的嘴巴咬她的手,然后一直说:“娃呀,不能替啊,能替妈早替你了。”第二次是那年我做乳腺手术,当医生说取出的结节看有点像癌变时,母亲一下子就蒙了。醒来后一看见我,一把抱住就哭,说我这么好的一个人,怎么就癌变就癌变了?后来,当化验结果出来被告知是良性时,她才破涕为笑。

如今,是母亲第三次在我面前流泪,而且,也是在我生病的时候,但是这一次,却是被我气哭的。母亲很少在我面前流泪,仅有的两次,也是在我生病的时候。生女儿那年,我剖腹产,因为麻药没打好,疼得在床上直打滚。母亲站在楼道里转圈,看见医生或者护士就把人家拉进来让我止痛。当她们说最终还得自己忍受时,母亲就哭了。她抱着我的头,让我的嘴巴咬她的手,然后一直说:“娃呀,不能替啊,能替妈早替你了。”第二次是那年我做乳腺手术,当医生说取出的结节看有点像癌变时,母亲一下子就蒙了。醒来后一看见我,一把抱住就哭,说我这么好的一个人,怎么就癌变就癌变了?后来,当化验结果出来被告知是良性时,她才破涕为笑。

母亲总是怕拖累儿女,有病经常一个人默默地扛着。有次我回老家,父亲偷偷地对我说,你妈腰疼得不行了,晚上睡下都哭呢!我一听,便抱怨母亲不给我打电话,她却说是,这是,又不是急病,你听你爸在那胡说,我掉眼泪是做了个噩梦。我一时无言,心中不由地掠过一阵疼痛,为母亲的倔强而唏嘘,也为自己的不孝而内疚。

住院期间,母亲拒绝我们接送送,非说自己一个人能行,实际上,她是怕耽误我们的工作,在她心里,孩子们的事永远比她重要。我常常想,我们都是被父母惯着长大的,但母亲却不曾享受这样的待遇。她是家中长女,七岁开始踩着板凳给父母做饭、送饭,家务活全包不说,还要带弟弟妹妹,未曾享受过一天好生活。十七岁嫁到夫家,常像个男人一样挥锄头,只为多挣几个工分让半患肚痛的困顿有一丝希望。母亲的一生都是忙碌的,但她呈现给儿女们的,常常是那种低微的人性之美。

想起这些,我不由抽着一张又一张的纸擦鼻子,那纸上沾满了悔恨的泪。正准备打电话给母亲道歉时,门突然响了,母亲提着一大袋子水果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,她告诉我,电视上专家说了,吃水果有助于身体康复。

本以为母亲被我气回家了,谁知竟是不觉地买水果去了。刹那间,我浑身的酸痛不知不觉地消失了,在我的意识里,母爱是治愈一切疼痛的良药。

母亲坐在我的身边,剥着一瓣又一瓣的橘子让我吃。月光下,她像一尊永恒的雕像,饱经岁月风霜后,变得越来越伟岸。

接过香甜的橘子,我一脸内疚地说:“妈,刚才我错了,惹你生气了。”母亲说,想啥呢,我刚才掉眼泪是心疼你!你看看,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你肩上了,要照顾老人,要照顾孩子,还要上班,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!

说着说着,母亲的眼眶就涌起了水雾。我坐在老人家的跟前,咀嚼着她掉在橘瓣上的眼泪,就像尝到了一条河流的甘甜。

茶古

武开龙

“茶古”是老刘的外号,认识他的人一律叫他“茶古”,至于外号的来历,没人能说明白。茶古不嫌弃人家喊他“茶古”,你用多大声叫“茶古”,他就用多大声答应。茶古黝黑结实、目光如炬、声似洪钟。他年纪不小,我认识茶古的时候,他就年逾古稀了。那时,我还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,茶古的岁数和我爷爷差不多。我不好意思像别人一样唤他为“茶古”,每次遇上他都叫一声“老刘”,然后给他递上一支烟。久而久之,茶古和我混成了兄弟。

茶古好烟、好酒,据他自己透露,年轻时候的他还嗜好。好色的茶古我没见过,他对烟酒的嗜好,真让我大开眼界:他随身携带一个塑料洗衣粉袋,袋子里装满了烟丝,烟丝的旁边夹着一沓厚厚的白纸。白纸裁成长方形,人家裁的是两指宽,两寸长;茶古裁的是三指宽,三寸长,卷出来的烟卷总比别人的烟卷长。

茶古不用带火柴,起床后点燃就行。不管休息还是干活,茶古嘴上时时刻刻都叼着一个“喇叭筒”,烟卷就像长在他的嘴角一样。感觉嘴上的快完了,茶古就立马掏出白纸条,往上撮一把烟丝,伸出舌头把纸条的边沿舔湿,卷成一个喇叭筒,及时续上火。烟头一明一暗,茶古好似腾云驾雾……直到上床睡觉,挂在茶古嘴边的火才会熄了。

至于酒,人家平常充其量一日三餐,他一日却要三餐:早中晚餐之外,还要加上早上午、临睡前的加餐。遇上年节,茶古可以从村头喝到村尾,从早上喝到晚上。喝得面红耳赤、舌头不使唤、腿脚不受控制,只要有酒,他就不会停杯。

有一年春节,茶古在村里从早喝到半夜,回家的路上头栽在冬水田里。田坝口正好有一股水流到了他的嘴里,这一次,也不知茶古在稀泥里躺了多久,喝了多少水。直到他儿子找到他,茶古的肚子胀得滚圆,嘴里还在嘟囔着:“莫……睡……了……莫……睡……了……”就这个故事,我还专门向茶古的儿子求证,他说,不仅确有其事,而且寒冬腊月里,父亲躺在田里居然没感冒。

茶古说:“酒是粮食精,越喝越年轻;烟是百草王,越吸越年轻。烟酒茶饭是每个人自带的口粮,断了,也就完蛋了。人啊,能喝就喝,能抽就抽!”满口黑牙、手指发黄,酒气熏人的茶古也确实身体强壮,七十来岁的人除了把田地里的庄稼打理得让人羡慕之外,还有一手绝活——挖井。

茶古挖井有自己的规矩——在主人家选定的范围内不是由他确定的地点不挖,主人家不满意的不收工钱。茶古挖井,不仅是体力活,还是技术活,更具神秘魔幻色彩。

记得那年秋天,我所在的一所小学很是缺水。学校从外地请来了一个挖井班子,在操场捣鼓了一个多月,辛辛苦苦挖了口十七八米深的井,可水未见到半滴。挖井师傅垂头丧气,在操场上留下一个仰望天空的独眼,只好卷起铺盖溜之大吉。

校长听从乡亲们的建议,决定请茶古来试试。傍晚时分,夕阳西下,醉醺醺的茶古叼着半截烟卷,摇摇晃晃地来到了学校。他东瞧瞧、西望望,要校长弄来了一个菜碗,然后又摇摇晃晃在土地庙里拿了三支香、几张纸钱。当着众人的面,茶古口中念念有词,将碗扣在地上,跪地燃纸焚香。一番操作之后,他告诉校长:不要动这个碗,明早他会过来确定井的具体位置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就被茶古的声音吵醒了。大家围在茶古身边,茶古像一位视察工作的大领导,在烟雾缭绕中,茶古将他的右脚后跟在地上扭了一个圆圈的坑,他大声说道:“就在这里,就在这里,一个星期见成果!”茶古的脚后跟离枯井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,大家将信将疑,好在茶古有言在先——不满意不要工钱。

真是奇迹,五天之后的中午,茶古从新挖的水井里爬出来,把校长叫到井口,将校长嘴边的烟叼到了自己的嘴里,使劲地抽了几口,指着井底示意校长看。校长惊呆了,一股清流在井底汩汩作响,阳光在水面上疯狂地跳跃,像充满了活蹦乱跳的鱼儿……

接下来的两天,茶古将新井和枯井打通,枯井又成了蓄水井。从此,学校再也没有缺水过。

竣工的那天晚上,月亮很圆很大,学校炒了几个菜,把餐桌搬到井口边。大家轮番向茶古敬酒,他喝了个烂醉。校长买了一条“火炬牌”香烟放在茶古的兜里,茶古边抽边分发,临近月亮下山时只剩下了三包。

大约三个月后,茶古死了。临死前的一个月,茶古不抽烟也不喝酒,他说,他这一辈子带的粮食已经被他“糟蹋”完了;该他做的事,他也做好了,该走了。据说,茶古是笑着走的!